

# 建国初期民族院校开展的社会调查述论

文 / 刘鹤 刘喜凤

**摘要:** 建国初期,民族院校设立了研究机构,选调人才,并将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作为其主要任务。民族院校深入民族地区,开展了民族识别、民族语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调查的开展,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为党和政府了解国情、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建国初期;民族院校;民族调查

**中图分类号:** G75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652(2018)03-0179-03

长期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歧视少数民族,视少数民族地区为畏途,不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推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提倡、鼓励开展民族调查。民族院校积极落实,并设立了相关机构,选聘人才,积极开展民族调查,并取得了突出成果。

## 一、建国初期民族院校开展社会调查的优势

建国初期,根据《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建立研究部”的要求,民族院校大都设立了相应机构,并聘请知名人士担任负责人。1951年1月,西北民族学院筹建了学校第一个科研机构——研究室,张吾吾副院长兼任研究室主任<sup>[140]</sup>。西南民族学院成立之初,就着手组建民族研究室,由夏康农副院长兼任主任。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研究部,下设5个研究室,由翁独健任主任<sup>[2173]</sup>。1953年6月,广西民族学院正式成立研究室。1956年更名为民族问题研究室,苗延秀担任主任<sup>[320]</sup>。1954年,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成立。“第一任主任由组教科科长赵子安兼任,第二任主任田曙岚(党外人士,贵州史学界的知名学者)”<sup>[411]</sup>。

这些机构集聚了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成立时,民族研究人员只有李志纯、杨元芳2人。1951年底,李家瑞、吴从众、欧潮泉和吴逸云加入。不久,罗运达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研究室<sup>[5]</sup>。1953年,玉文华副教授和陈宗祥从四川大学调入。同年夏,吴泽霖教授调入。1954年,西南民委李茂郁加入研究室行列。1956年,李安宅教授、于式玉教授、罗荣宗教授也调来该校。一时间,研究室人才济济,人员增至20余人<sup>[6129]</sup>。建国之初,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

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王静如、马学良等40余人齐集中央民族学院<sup>[264]</sup>,成为研究部的专职、兼职研究人员。1951年3月到1952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大力调入“学有所长的少数民族社会人士”。如西北农林部副部长、蒙古族老干部白海风、回族史学者马霄石、藏族翻译工作者黎宗华和兼通蒙藏语文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却太尔<sup>[1128]</sup>。这些专家学者大多成为研究室的骨干力量。

这些机构明确将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作为主要任务。广西民族学院规定研究室的任务是:“对全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语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协助本院和省直有关部门作好民族工作”<sup>[3121]</sup>。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强调研究人员要“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方式方法”开展民族调研,“要经常深入到西北民族地区搞实地调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把这一活动经常化、系统化”<sup>[1140]</sup>。

## 二、建国初期民族院校社会调查的开展

### (一) 积极开展民族识别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以往民族成份和族称混乱的状况,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政府部门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民族院校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

1953年9月至1954年5月,在中南民委的领导下,中南民族学院专家先后对广西尚未确定民族成分的民族进行调查甄别工作。前一次主要是调查龙胜县的伶人、黎人和苗人,罗城县的仡佬人,环江县的毛难人(毛南人),南丹县的水家和隔沟人的情况。后一次主要是调查平果县的陇人、防城县的越人(京人)及龙津县的俸人情况<sup>[7147-48]</sup>。广西民族学院研究室成立之初,就“着重进行中南区少数民族成份识别的调查研究”。

1953年8月至1954年6月,该校专家配合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省民委调查了广西境内的仡佬、毛难、傣人、水家、伶人、阳山人、六甲人、隔沟人等十几个民族单位。1955年2月到4月,根据中央民委指示,学校抽调专家赴京参加中央民委组织的民族成份识别研究组工作,对该校担负调查的中南地区未决定的民族成份情况进行研究和整理。至此,中南地区民族成份的识别调查工作告一段落<sup>[20-21]</sup>。1955年3月至7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畲民调查组赴粤调查,历时4个月,主要开展了民族识别调查<sup>[2175]</sup>。

一批杰出的民族学家投身于民族识别调查工作中,如中央民族学院的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鉴于“土家”族识别长期悬而未决的状况,从1953年初开始,潘光旦“埋首书案,博览史籍,通阅地志,搜读笔记,遍求经、辞、诗、集。凡涉及‘土家’资料,无不博广采撷”,并不顾身有残疾,亲赴当地调查研究,终于完成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该文的发表,为土家族的识别奠定了基础。1953年下半年,林耀华与同事傅乐焕、王辅仁等人深入黑龙江省龙江县、纳河县和内蒙古呼伦(呼伦贝尔)盟海拉尔、莫力达瓦等地调查,完成了对达斡尔民族的识别工作。1954年,他又带领包括同事沈家驹、施联珠、黄淑娉等人在内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文山、普洱等六个专区对彝、哈尼等少数民族进行识别调查<sup>[6]</sup>。之后,他主持编写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他们调查确认的云南少数民族,经国务院审定后,正式批准公布<sup>[2165-66]</sup>。

## (二) 积极开展民族语言调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机构就开始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初步调查。1956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七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

中央民族学院作为民族院校的老大哥,积极参加这一调查并起到了表率作用。为做好这次大规模的调查工作,1955年12月,中央民族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召开“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这是我国民族语文工作历史上的第一次科学讨论会。1956年2月20日,中央民委、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上,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苏克勤讲话,强调了民族语言调查的重要性。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承担了主要的

培训任务,如马学良教授担任第一讲和第六讲的主讲。临行之前,苏克勤又做动员讲话,强调民族语言调查的注意事项<sup>[2176-178]</sup>。

中央民族学院不仅积极参加民族语言调查的组织领导和培训工作,而且发动师生积极参加民族语言调查。1956年,马学良教授领导的语言调查工作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苗、瑶语。当年,戴庆厦从中央民族学院景颇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主要从事哈尼族语言工作,经历了哈尼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全过程<sup>[9]</sup>。因工作需要,年仅19岁的张公瑾从中央民族学院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担任傣族语文辅导教师。之后,他多次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云南西双版纳进行调查<sup>[2166-67]</sup>。

其他民族院校也积极参与到这一工作中。1956年2月,中南民族学院抽调的40名少数民族师生在严学窘副院长的率领下,前往北京参加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学习。结业之后,他们分别加入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第一、第二工作队,分赴贵州和海南岛参加语言调查<sup>[7148-49]</sup>。以严学窘为队长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不仅全面调查黎族方言的分布和异同情况,而且调查了当地苗族语言。在1957年2月举行的“黎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严学窘宣读了《关于划分黎族方言和创制黎文的意见》,为这一调查研究作了总结。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室也“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喻世长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布依族语言词汇的搜集、记录、整理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声韵的调查研究工作”<sup>[411]</sup>。

## (三) 积极开展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毛泽东提议、彭真亲自部署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全面启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调查。

民族院校积极参与了这次调查的组织领导,并参加了调查提纲的拟定。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费孝通、翁独健、夏康农、冯家昇等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领导工作,西南民族学院吴泽霖则担任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中南民族学院岑家梧担任了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组组长。1956年7月,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领导小组在中央民族学院讨论调查提纲,该校很多专家受邀参加。经过讨论,“调查提纲里提出了两个内容,即社会性质与历史的调查”<sup>[10]</sup>,从而为这次调查指明了方向。

民族院校积极参加了这次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1958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及其他有关单位组成了一支475人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1959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抽调师生135人,分赴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民族地区,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sup>[2]178-182</sup>。西南民族学院也积极组织师生参加调查。夏康农负责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组,成员有李志纯、玉文华及罗运达等。其中,李志纯、玉文华承担昭觉彝区调查工作,罗运达等深入木里调查藏族社会。刘忠良副院长负责四川藏区调查工作,成员有张全昌、苏克等。稍后,陈泛舟、徐铭也参与藏区调查,欧潮泉、李家瑞参加羌区的调查工作<sup>[5]</sup>。

一些杰出的专家学者投身于这一调查工作中,并提出了真知灼见,如西南民族学院的吴泽霖、中南民族学院的岑家梧等。调查期间,吴泽霖已年届花甲,仍然坚持实地调查。他带领的贵州工作组忠实、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贵州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发展现状。他在贵州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后来撰写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简史简志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实地调查资料<sup>[11]</sup>。1956年10月,岑家梧率领广东组到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

州,研究了解放后数年来有关单位对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材料,并深入到保亭县第三区毛道乡作重点调查。在此基础上,他撰文提出:黎族的“合亩制”“保存着原始公社氏族制,和从原始公社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材料,系统深入地调查合亩制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史与黎族早期历史,对研究解放后黎族合亩地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还提出“合亩制”地区“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应从实际出发”,“它既不同于一般汉区农民的道路,也不同于有了阶级分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道路。一般化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sup>[7]47-50</sup>。

### 三、结语

建国初期,民族院校积极参与了民族调查,并做出了突出贡献。民族调查工作的开展,不仅“以十分丰厚的资料和规模庞大的著述”传承了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又“对党和国家把握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际、进行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sup>[12]</sup>。

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省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新中国初期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院科通[2013]7号)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1]西北民族学院校史编写委员会.西北民族学院校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
- [2]荣仕星.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3]《广西民族学院院史》编辑委员会.广西民族学院院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4]贵州民族学院院史编写组.贵州民族学院院史(1951—1991)[C].内部资料,1991.
- [5]秦和平.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J].民族学刊,2011(3).
- [6]《西南民族学院院史》编辑室.西南民族学院院史(1951—1991)[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 [7]中南民族学院校史编写室.中南民族学院简史(1951—1979)[C].内部资料,1988.
- [8]潘守永.记民族学、社会学名师林耀华教授[EB/OL].[http://edu.sina.com.cn/1/2011-06-03/1525203165\\_2.shtml](http://edu.sina.com.cn/1/2011-06-03/1525203165_2.shtml).
- [9]陈菁霞.戴庆厦,谁来接他民族语言研究的班[N].中华读书报,2016-01-20.
- [10]李绍明,彭文斌.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
- [11]何孝辉.论吴泽霖对贵州民族学研究的贡献[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4).
- [12]郝时远.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作者简介:

刘鹤(1971-),湖南绥宁人,凯里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刘喜凤(1969-),女,湖南绥宁人,凯里学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史。